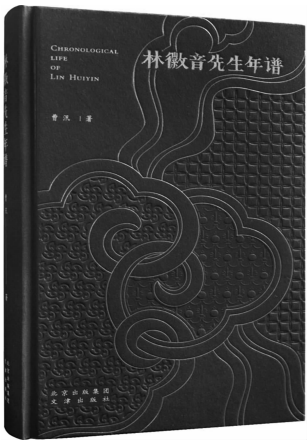


# 一代才女的真实写照

□陈华文



《林徽音先生年谱》  
曹汛  
天津出版社  
2022年7月

在中国现代文化历程中,林徽音(又名林徽因,1904—1955)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之所以家喻户晓,并非她和徐志摩、梁思成之间的感情故事,而是她的一生挑起建筑和文学的两担云彩,有一代才女的美誉。近年来,关于林徽音的各种传记可谓林林总总,可是很多都是捕风捉影,不足为信。作为“十四五”期间的国家重点出版物《林徽音先生年谱》,对于我们全方位、多视角认识林徽音的一生,提供了真实可信的资料。值得一提的是,该书

采用“林徽音”,而非“林徽因”。关于“音”改为“因”之故,在书中有详细的考证:那是1935年,为避免与上海一位男性无聊写家“林徽音”名字相混,忍痛改名徽因。

年轻时代,林徽音在文学和艺术方面表现出极高天赋,发表过优美的散文、为报刊画过精美的插图和封面,而最后,她把建筑作为主攻方向。对于这一点,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受到了梁思成的影响。1924年,林徽音和梁思成赴美国留学,1928年3月,俩人在加拿大结婚。海外留学时,她也原本计划像梁思成一样学习建筑,可是当时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不招收女生。无奈之下,她只好学习美术。学美术期间,她依然钻研建筑理论,且建筑图画得极好,先后被破格聘为建筑系兼职助教和讲师,直到大学毕业。

林徽音和梁思成最引人关注的是在中国建筑领域的突出成就。1929年,他们在美国学成回国后,在东北大学任教。也许有人认为,在梁思成的光环之下,林徽音或许只是一个配角或者助手。其实,她的才华丝毫不逊色。当时,林徽音设计的东北大学“白山黑水”校徽图案,就被该校选中。1930年中国营造学社成立时,林徽音和梁思成是第一批社员,她也是学社唯一的女社员。也就在这一年,她参与设计吉林大学建筑组群和锦州交通大学建筑组群。后来的1934年,她与梁思成共同设计

北京大学地质馆和女生宿舍。

林徽音不仅参与到建筑设计中,还对中国建筑进行理论探索。在她看来,中国建筑有几千年的历史,是中国优秀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而20世纪30年代,从历史和理论两个方面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学者凤毛麟角,林徽音就是其中的拓荒人。她撰写的《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是我国现代第一篇建筑理论方面的论文。在另一篇论文《平郊建筑杂录》中,她把建设提升到美学层面,首次提出“建筑意”的概念,这一直受到后世的推赏。

在中国传统建筑研究方面,林徽音绝非纸上谈兵,她和梁思成等人结伴行走大半个中国,对古建筑进行考察,那时的交通、住宿、饮食条件都很差,这并没有让他们打退堂鼓。每次见到一座古建筑,林徽音都非常激动,迅速投入到工作中。为了考察建筑的内部细节,她时常冒着危险攀爬到房梁之上搞测量、作记录。在深入考察和研究中国传统建筑中,林徽音愈发对中国历史文化充满敬意和自信。

然而,林徽音的建筑人生并非坦途。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让她和家人不得不踏上南迁之旅,一路颠沛流离,历经千辛万苦先到云南,然后去四川。现在我们难以想象,在国家遭受劫难、生活和工作环境十分恶劣的条件下,林徽音也没有放弃对中国传统建筑的挚

爱。抗战期间,她积劳成疾,身体虚弱,有时卧病在床。即便如此,1941年至1943年,她协助梁思成完成《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与写作。该著作第六章中的《北宋之宫殿苑囿寺观都市》《辽之都市及宫殿》《金之都市宫殿佛寺》《南宋之临安》等章节,全出自她的手笔。1945年抗战胜利后,梁思成到清华大学创办营建系,而林徽音一到学校,就为教师设计胜因院住宅。当时的教师不多,她带领年轻教师开展教学,自己也开设了不少课程。由于她的病情不断恶化,1947年底住院做了肾切除手术。即便如此,病中的她坚持在床上给学生上课。

新中国成立后,林徽音全新的生活篇章开始了。1949年至1955年,林徽音完全告别了文学创作,激情满怀投入到建筑与设计领域。她参加和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还负责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座和碑身设计雕饰纹样和花圈图案……

《林徽音先生年谱》以简洁扼要的语言,逐年记录林徽音精彩又坎坷的一生。她出生、成长、求学和工作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战乱中度过的,以她的家庭背景和才学,完全可以选择安逸的生活,可是她没有这样做,而是鞠躬尽瘁,把才学和智慧交给了为之深爱的祖国。她的爱国情怀、创造热情、惊人毅力以及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 细数时代的每一个脚步

□胡胜盼



《烟霞里》  
魏微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年12月

长篇小说《烟霞里》,是魏微在文坛沉潜十几年后推出的转型力作,被读者称之为“中国版的《悠悠岁月》”。《烟霞里》是一幅幅画面,让我们看到曾经经历过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国企改革、城市化等推动我们时代发展的一行行历史足迹。既有时代的波澜壮阔,又有平凡人生的生动细节。

魏微既属于“70年代”,她又时常逸出这

个年代,她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和清醒的文学方向。魏微成名较早,她的《化妆》《大老胡的女人》《一个人的微澜》《拐弯的夏天》《胡文青传》等都是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品。《烟霞里》对时代脉搏的把握,对个人命运和大时代之间那种细小、直接的关系的建立,下手非常准确、利落、坚实。这是一个新存在主义式的小说。它让这个时代、历史、社会的内容附着在人的身上,让人的形象本身体现出我们时代的内容。尽管魏微在《烟霞里》中实现了一种力量的转型,但她并没丢弃此前文本中细腻婉转的抒情特质。整个小说其实就处在一种烟霞里的状态。经过多年沉潜,魏微那种标志性的抒情依然在,不时给人惊喜,其中又有非常坚实的内核,使得该书既具有宏阔的历史感,又有女性主义的特点。

小说主人公田庄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一个小山村,读书,上班,结婚,生子,2011年去广州生活。作为改革开放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她走过的人生之路,也与整个国家在这四十多年中的发展变迁同步。这些从田庄身上漫过去的时代浪潮,也同时灌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田庄有着乡镇、县城和一线城市等三种生活体验,她的经历涵盖了当下

大多数人的成长轨迹。沿着田庄的成长地图,无论是70后、80后还是90后,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共鸣的一个角落。

魏微将散文、纪传体、编年史、综合视角、田野调查、笔文笔法等熔铸一炉,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小说文本。书写时代记忆,描摹精神成长,是文学写作的重要题材。文学总是处理记忆,《烟霞里》用社会变迁与个人生活起伏所交织的力量,以1970年为起点,平行推起每一年的生活流。主人公上县城、离开乡土;盖房子,成为城里人;高考冲刺,南下广州;买房炒股,赚外快;旧城改造,招商引资;互联网经济、智能手机时代……《烟霞里》的这段记忆刚刚过去,还留有新鲜的味道。小说以崭新的编年体形式,把一个女人的成长经历与四十年来的时代发展的重要步骤编织融合在一起,实现了历史与非虚构两种文学气质的完美对撞,完成了个人与历史的直接对话,给文学处理记忆提供了新的尝试路径和样本。

70后作家对家国故园这一文学主题的责任承载和书写深情,自然汇聚成了焦点和亮点。田庄后来读大学、考研,又南下定居广州,她的每一次回家过年,都变成了一种警醒:故乡,是回不去了,但仍然要回。同样的命题也

给到县城里的父母:儿女,长大了是留不住的,但仍然要回。于是,漂泊、返乡成为70后、80后的集体心结,流变、持守也成为乡土中国现代性的核心经验。“人事空怀古,烟霞此独存。”在魏微的理解中,生命是流逝的,但又是源远流长的,在朝霞初灿之时,在晚霞蒸腾之时,那种烟霞朦胧的意境里,某种程度上也像每一个平凡人懵懵懂懂、磕磕绊绊的人生。

《烟霞里》由凡人琐事有序累积而成,但将这些凡人琐事的细节读罢,书一旦合上,就会发现我们手里捧的是庞然大物。魏微十几年读史,成就了自己新的思维惯式。对文字有着极高要求的她不愿急就章,也不再满足于体验式写作、仅凭绒毛般的敏感去迫近人性,而是逐步潜入历史、时代与人性的深处,从总体上去呈现时间与万物、与个体生命之间的隐秘关联。“田庄之于我,就像方鸿渐之于钱钟书。时代笼罩着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背后都有大历史。”一个从小村庄走出的女性,坚韧地活着,她的一生似乎都在积攒一种力量,期望绽放出绚烂的烟火,而悲剧的是,以英年早逝为结局。生命的绽放与消逝,如烟如霞;追问生命的意义,这也构成了小说的题眼。

# 让她们照见她们

□夏丽柠



《我看见无数的她》  
张莉  
九州出版社  
2022年11月

《我看见无数的她》的作者张莉,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最受研究生欢迎的十佳教师”。书名如其人,张莉的身边确实围绕着无数个“她”。在这些个“她”中,不仅有张莉日常工作中研究的文学对

象,也有在教学中向她汲取知识的女大学生。本书的创作,就缘起于7个“她”的脑力激荡。

从2021年夏天开始,直至2022年春天,每周三或周四晚上,张莉会按计划重看一部电影或者重读一篇小说,并在笔记本里写下感受。然后,她又以讲稿的形式与六位女研究生一起讨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书的文稿引领了七位女性的讨论。与这些出生于上世纪末的女孩,张莉眼中的新新女青年进行讨论,并未让她感觉到被孤立。反而,她意外地发现在许多问题上她们都能达成默契。当然,新的视听媒体上的弹幕观点也并非对她们毫无影响,而由此造成的“新青年”与“老青年”之间的观点分歧,也就保留在那些柔美的月光里。

我们知道,女性的成长经验绝大部分来自于母亲、师长、姐妹和闺蜜。《呼啸山庄》《简爱》《呼兰河传》等从“女性视角”出发的文艺作品,则唤醒了女性对清新生命经验的渴求,带来了我们对女性世界的全新认知。说起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起源,文学爱好者们立刻能列出冰心、凌叔华、张爱玲、萧红等一众民国女作家的名字。作为女性文学的先驱,她们确实是值得称赞的。但她们身

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恐怕是那个时代的普通女性无法企及的。她们都是在男性家庭成员的支持下,取得了走出家门受教育的权利。在“不缠足、走出家庭、进校读书、与同龄女性交流、出外旅行、参与社会活动、与男性交往……”等一系列社会行为之后,她们形成了“妇女是人——有着独立自由意志的人”的观念。

在这些女作家当中,最令人惋惜,也最值得写作后辈学习的是萧红。她的勇敢不仅表现在文字的开阔与洒脱,更在于她敢于直面女性的痛苦与“堕落”。她可以把一个病后美人描写得像鬼,也可以不顾那个年代国秀文学的体面,去写女性的伤口、鲜血和屈辱。恰恰是她笔下的“丑”,才将女性生存中金子般的体验公之于众。这样的书写,不仅要打败男性书写,还要打败“高洁”的女性书写,才能奇迹般地抵达女性视角本身。萧红,非常了不起。

如果我们经常阅读和看电影,就会发现以女性视角书写,并非女作家的专利。许多男作家也会以女性视角展开故事。比如鲁迅在《彷徨》里塑造的子君,就代表了一个想要逃离旧的社会制度与家庭伦理的女性形象。她的悲剧在于无处可

逃。保护女性,就是保护全人类,不要对女性的悲剧充耳不闻,这个道理,在今天依然适用。

本书里,张莉三次谈及了毕飞宇。可见,这位男作家在女性文学序列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哺乳期的女人》《青衣》与《推拿》,都是毕飞宇的重要作品。我最喜欢的是《青衣》,这部小说里,提出了一个亘古不变的问题:女人需要事业吗?从毕飞宇笔下筱燕秋的视角出发,她的一生都是青衣,她是嫦娥,她要冲破重重阻力奔月。这些阻力包括生育期间不能登台,人到中年无法保持状态,身边人对她执着事业的不理解。大多数观众都认为筱燕秋的奔月是个悲剧,广寒宫里多冷清啊,可对于一个将自己热爱的事业,像一团火一样藏在心里的中年女性来说,真正的寒冷在人间吧,令她感到寒意的,是那些认为女性在结婚生子之后,只能以家庭为重的社会舆论与环境。

正如张莉在后记中所说,“通过讨论,我们互相敞开,也互相辨认。辨认有时候是为了更好地在一起,辨认有时候也是为了更好的分离,分离出另一个自我,另一个我们。”这就是女性文学的力量。